

Book Review

Tian Yuan Tan, *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0, 293 pp.

布尔迪厄理论视野下的明曲研究

《逍遙与散誕：16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场域》书评

Tian Yuan TAN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tianyuan.tan@ames.ox.ac.uk

Reviewer: 吴宇嘉¹

Yujia WU

中国西南大学文学学院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wuyujia0929@163.com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442554>

陈瀛沅（Tian Yuan Tan）著、周睿译《逍遙与散誕——十六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场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是原作者哈佛博士毕业论文英文版的中译本。在专著面世前，作者曾发表论文《明中叶曲家康海资料的新发现及其价值》（董建、荣广润，2006: 179–196）、《康海后期南曲小令创作初探——兼论【浪淘沙】曲牌的几个问题》（陈庆元，2009: 1065–1076）等，后又编校《康海散曲集校笺》（陈瀛沅、孙崇涛，2011）。因此，《逍遙与散誕》乃是陈瀛沅教授历年治学结晶，并运用布尔迪厄理论方法研究明代北方曲家场域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本书勾勒明中叶北方主要“曲家圈子”（*Qu communities*）的历史形成过程，借助原始明清刊本与钞本，以康海、王九思和李开先为中心，还原陕西、山东两地曲家圈子的历史语境，将研究视野从文人个体扩展到与之有阶层联盟、地缘、共同兴趣、文类交流等联结的文人群体，突出了明代中叶曲作原生语境的社交性和场合性。此课题在国内戏曲研究界与西方汉学界，尚属首创。该著既裨益于明代戏曲史研究，亦启发这一时期相关文学史论题的探讨，例如在家乐戏班、寿曲、私家班子刊刻传播戏曲集等文化现象的史料发掘上，独探骊珠、新见迭出。

收稿日期：2025-08-26；修改日期：2025-10-09；录用日期：2025-10-23
作者简介：¹吴宇嘉，西南大学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以柯律格 (Craig Clunas)、柯霖 (Colin Hawes) 为代表的社交互动研究和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开创的场域研究，在方法论创新方面贡献突出。一是深化了学界对此一时期主流曲家作品生成、传播、接受语境的理解，通过文本细读和语境重现，作者提出了诸如《沽酒游春》里“王九思就是 (is) 杜甫”(页 80)，《王兰卿真 [贞] 烈传》“模拟一次圈中文人雅集”(页 129) 等合乎情理的判断。二是明确陕西、山东二地曲家圈在明曲史上的地位，他们为本地内外、后世曲家圈子确立了新的文学样式和人格范式，即离经叛道、逍遥散诞的群体经验和以散曲为主的综合性文艺创作形态；陕西、山东曲家场域是明中期北方戏曲圈的杰出典型，上承明前期私人作曲之势，下启晚明江南文人戏剧热潮。三是陕西、山东曲社与明中期诗文社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功能，对文体研究有借鉴意义。

除上述史识、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陈著继承其师伊维德 (Wilt. L Idema) 的严谨学风，在曲学著作文献考证上功力尤著。首先，本书体现出极强烈的底本和善本意识。陈教授通过实地调研，借助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杜子美沽酒游春记》，重现了嘉靖本的结构和内容(页 90)；参校古籍影印本和现代整理本，补足后者的排版缺漏(页 254n5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于台湾“国家图书馆”中，“新发现”了《浒西山人初度录》《汎东乐府后录》，依此补充《全明散曲》失载曲家 13 人(见书末附录)，辩正《全明散曲》系名吕柟之误(页 161–162)。这些文献学发现亦有助于本书评的论述，比如《汎东乐府后录》收康海所有次韵小令，《浒西山人初度录》补全了《北宫词纪》未收录的康海寿曲，此二种文献有益于研究康海曲家圈的社交情况。此外，作者还在考订圈子成员时严取标准，宁缺毋滥。凡此种种，都使得本书具备极高的文献可信度和征引价值。

陈著问世后，在域外汉学界迅速获得好评，明曲研究学者夏颂 (Patricia Sieber) 的评价颇具代表性，其褒许陈著“成功地通过参与曲作活动而形成的曲家圈子来呈现曲创作、传播和接受各个环节相关的创作群体全景，在材料运用上采用了诸多海内外新发现的、甚至不少是首次被西方学界所注意到的原始文献”，标举出陈著的方法论与文献学创绩 (Sieber, 2012)。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陈著的引介和述评尚与其成就不相匹配。书评仅见《戏曲社会学的型构与实践——评陈瀛沅〈逍遥与散诞：十六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场域〉》(李颖瑜, 2023)，书评以引荐为主；而陈著的研究方法如“曲家圈子”、文类选择，以及考证结论，则反映到了少量的同题单篇论文与学位论文里。因之，对陈著方法论的进一步补充和对话更显必要。

一、对陈著场域“边缘性”的结构化讨论

陈著研究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重建以王九思、康海为代表的陕西曲家群和以李开先为文化领袖的山东曲家群，证实“曲”这一文体在其中显现的“逍遥与散诞”的表述功能。例如作者认为：

这是一个以散曲和剧曲创作来寻求超然自适与离经叛道的生活的专属“风流社”，是由一群不断在纾解官场失意、追求相互慰藉的受挫文人所独创的自许之地（a world of their own）。（页 186）

著者陈麟沅定义“圈子”的三要素为，“圈内成员的社会层级、彼此的空间联系、以及他们共同的兴趣或价值观”（页 15），要之即身份、地域、旨趣。其中，最具场域向心力并体现认同度和区分度的标准可能是“旨趣”，著者“把参与某种文类的写作视为融入某个‘圈子’”（页 15），认为“创作曲作、参与曲社意味着对某种生活方式的体认，是区别于一般文人的独家符号（distinctive signs）”（页 308）。此处提及的区判符号，即结语部分指出的“边缘的地位、场域和自我世界”（页 326）。

场域的区判符号理应贯彻至场域建构的主要环节，此外，在部分环节，陈著未能自治地呈现出“边缘”“逍遥与散诞”的区判特质，后者或许影响了曲家圈子的定性判断，因之值得深入讨论、补充完善。我们可以按作者对“圈子”三要素的坐标线索来逐一考察并尝试作出文献补充。

（一）次要成员文化活动的场域占位

首先值得考察的是曲家圈子的核心要素，即文化宗趣的形成与凝结。陈著主要将文学事件处理为自发形成的过程，较少着墨于背后的价值建构和权力争夺，而这恰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阐释维度。这里并非仅指视野的宽窄之别，而是意味着将论述重点，从以领袖为主导的同心圆结构转变为集体运作的社会关系网络，并通过这种方法揭示不同成员的文学活动与场域性质功能之间的双向影响，表彰成员们在“逍遥与散诞”话语建构中各自的贡献。

按照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路，圈子成员曲作的存世数量可以反映其创作实绩，被收录数量、唱和次数可佐证其文化影响力，成员相互间作序、品评则是话语权的表现，圈内成员之间相互学习与品评，亦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贡献，值得区分这些文化实践的不同功用。例如，关于成员作品的存世情况，多数成员仅存单篇于文化盟主的唱和集内，但康河的一首套数却被收入《北宫词纪》，高应玘《醉乡小稿》有 101 首曲，张炼有《双溪乐府》收录 203 首小令，38 首套数。再如，成员间的互相作序与品评。由于李开先圈子成员更具民间性，文化资本比社会资本有时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与稍后将要论述的康海圈子形成对照。后者仅有张炼曾为《浒西山人初度录》作序，而山东富文堂曲社中的袁崇冕、谢九容、谷继宗、高应玘、苏州、王阶、刘北滨、杨盈、姜大成、陈德安、夏文宪都曾为李开先的曲集《卧病江皋》《傍妆台》《宝剑记》等作序。李开先《新编林冲宝剑记》卷首序与跋尾（李开先，嘉靖本：36b–37b），分别以苏州和姜大成的书法体与印刷体两种风格刊出，更体现出他对两位成员才艺的真诚欣赏。细绎文本，还能发现曲社成员对“以曲为隐”的独特认识。例如高应玘自谓“余自蚤岁，僻性散逸，酷嗜词曲”（高应玘，嘉靖本：卷首），这似乎显示出圈内成员对曲作隐逸性质的自我追认，为理解

圈子的集体文化氛围留下了珍贵证据。

曲家圈子次要成员的文本流传情况劣于文化领袖，陈著认为“‘这群’文人参与阅读和写作散曲，不过是因为他们生命中出现了‘这次’社交活动而已”(页250)。只是，数量稀缺也可能是经过选择的结果，更何况场域中的任何文化实践都不是一次性、孤立、静态的，它们在相互关系中发挥了独特的占位与建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化活动超出了布尔迪厄理论的范畴，以文学的特有形式展开，包括赓韵、祝寿、同题书写、彼此唱和、相互作序、合作编书等，这显示出理论本土化与对话的重要契机。

(二) 边缘者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贡献同构

与次要成员文化功能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属性。著者意识到“对文学圈子的研究让我们能够‘避免仅把抽象的个体作家当做文本生产者的观点’”(页16)。只是，实际的个案研究章节皆以康、王、李为研究对象，圈子其他成员的立场、成就、贡献被模糊处理，他们被概称之为贬谪士人，其依附性高于功能性。然而，不同成员进入场域时，携带的社会资本量各异，身份的“边缘”程度互歧，需要区分对待。学者李颖瑜即在其书评中指出，高官与李开先唱和的现象，与陈著关联散曲之边缘与身份之边缘的总体判断相龃龉(李颖瑜，2023)。在此，我们可以以陕西曲家圈为例，研讨场域不同成员的角色定位。根据陈著勾勒的圈内成员名单(页157—164)，我们可将其中身份可考者的历任最高官阶作出如下等级递序的排列：

何瑭，南京右都御史(张廷玉等，1974: 7256)；马理，南京光禄卿(张廷玉等，1974: 7250)；杨武，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九思，1997: 203b)；东汉，南昌知府(康海，贾三强、余春柯，2015: 721)；康浩，嘉定知府(金宁芬，2004: 269)；康河，赣州知府(王九思，1997: 265)；张炼，湖南按察司佥事(金宁芬，2004: 278)；张治道，刑部主事(金宁芬，2004: 177)。此外，熊子修官居御史(王九思，1997: 224)，但由于检察权独立，需要单列。

更重要的是这种身份分层对曲家圈子活动产生的影响。陈著统计出了陕西曲家圈子自寿与祝寿曲目数量(页165—170)，翻检《渼陂续集》《醉乡小稿》《全明散曲》等相关文献，我们可以把陕西曲家圈社交性献曲合计数据(包括寿曲、宴曲、节日曲、会面曲等应酬唱和制曲)累加上圈内成员互作墓志铭(或传记)的数量，得到的作品数量按照降序排列，则依次为：张炼、杨武、马理、何瑭、熊子修、东汉、张治道、康河，以及康浩、康梧、张伯赵各1首。查询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数据库，次要成员与圈外社会人士的社交性作品(题咏、墓志、书信、唱和等等)数量递序与此相仿。

陕西曲家圈成员的社交性作品，无论是就场域内部或外延，其数量排序几乎与他们的官阶递序重合，足以说明，尽管曲家圈子偏离于政治文化核心场域，但不同成员从中心地带携带而来的社会资本、权力资本仍对场域结构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若说陈著原表乃是以编年方式将曲作据量统计，正文又以亲属、友人、化名的身份标识为划分依据，此处的层级化分类方式则

尝试为之赋予多维参照系（官阶递序、社交性献曲递序、次要成员的参与），将之还原为多重势力累加的立体化场所，希望让场域的“边缘”性质得到更明晰的定位。

国内前辈学者将元散曲作家分类为“达官显宦”“下层胥吏”“才人作家”，这种分类法在此处或许仍然有效（页 64）。通过身份划分，可以明显看出陕西曲家圈具备较强的“退隐”特征，他们多数集中在中等官阶，宦海沉浮能加深这些人对归隐与边缘身份的深切认识。例如，张炼为康海所作的寿曲、序文中会“流露出他对官僚生涯的拒意”（页 178）。

（三）地域边缘与文学边缘的同构

陈著以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亲疏来划分主流与边缘，为陕西、山东两地的地域边缘性质奠定总体基调（页 326）。但此种总体判断亦有值得完善之处，正如作者在李开先《傍妆台》案例中指出的那样：“读者圈的确立并非必然基于共同的生活空间，超绝地理边界的虚拟圈子也能通过散曲的传播、赓和和序跋来实现构建。”（页 238）地域与文化场域的同构存在更为复杂的模态。

一方面，地域文化的“边缘”对“中心”的反响在不同的文类中呈现差异，此点已在陈著中得到暗示。例如，《宝剑记》与《傍妆台》，一为南剧，一为南曲，南方戏曲界对其评价有异，折射出地域认同对不同文类的差异态度。另一方面，文化符号的认同有时比地域联盟产生了更实质性的效用，或曰二者双向影响。例如，《傍妆台》乃李开先退隐抒愤之作，更易引起同处身心“边缘”状态者的共鸣，包括“韦布孤穷”的韩儒（李开先，清钞本《中麓小令》：41b）、“晚景孤村、僻吟诗解”的康浩（同前书：43b）、同时罢官的故僚欧阳铎（同前书：31b）、僻居一隅的旧友江以述（同前书：41a），而张伟缺乏从政治中心退居后方的经验，即使他与李开先同乡，此种“边缘感”却相对淡薄（同前书：34b）。因之，如何将地域限制的“边缘”放在文学场的条件之中加以细致研究，是值得后续研讨的命题。

（四）核心问题：场域“边缘化”的自治性

对地域、身份、旨趣凝结三个方向的考察与补充，显示出陈著在此次曲家场域建构中，既有独辟蹊径的发覆，亦存在不经意的遗漏。本书评的探讨重心，聚焦于作为政坛高层、文化精英、曲学领袖的康海、王九思、李开先，在“边缘”场域中的支配作用，似乎未及展开对场域核心命题——“边缘”——的细致甄别、推敲和定性。包括作为“边缘”的低阶成员的话语参与，以及边缘地域与边缘文化的场域同构异质、文化领袖与次要成员的权力结构等命题。我们可以追问：若次要成员对“地域、身份、旨趣”三要素有不完全等同于文化领袖的理解，两种层级的成员在“边缘”场域与其他场域的关系中发挥不同作用，我们应当怎样再度重审具备多层结构的“边缘”文化呢？

对上述场域三要素的重新审定还显示出，曲家圈子的边缘文化并非一元的、孤立的、自足的，它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源于群体和社会。我们注意到原书作者存在对场域自治性的困惑，场

域既是自愿自适的(页42),又充满了与其他场域相对而言的展演性质和话语抗争(页67、71)。以下我们将引入布尔迪厄理论,对场域边缘文化的建构性作再度剖析。

二、布尔迪厄“文学场域”方法论的深入剖析

布尔迪厄为文学场域研究指示了三重路径:权力场域与文学场域研究,文学场域内部研究,文学场域惯习研究(皮耶·布赫迪厄,石武耕、李沅洳、陈羚芝,2017:334)。关于第一个方面,陈著对文学场域的社交性、群体性用力最深,已如前引言所示。第二个方面,作者主要关注场域的权力结构和符号资本。前者主要体现在对李开先凭借仕宦、财力、文坛资源而成为文化盟主的分析(页320–321),后者主要体现在对“符号资本”(原书指隐逸这种区判性符号)的塑造。最后,由于明中叶曲学是本次研究的重点所在,与之相关的历时研究则留待后续探讨。

利用上述布尔迪厄的场域结构理论和动力分析方法,我们或许能在陈著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理论建构与扩充。

(一)文学场域的独立性与建构性

在本书研究中,重要的环节是构建文学场域与政治场域的结构性关联以及二者之间的资本转换。戏曲文学对于政治权力场域明显的依附性无需在此赘述。我们可以重点关注文学场域的符号资本与政治场域之间若即若离的紧张关系。陈著认为隐逸符号作为区判性特征是自足自治的(页42),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符号积累(页44、308),前后的论述似有欠圆融之处。

布尔迪厄理论指出,符号劳动是一种“否定自己是经济资本的经济资本”(戴维·斯沃茨,陶东风,2006:172n2),它“通过把利益关系转化为超利益的意义、把权力的武断关系转化为事物的自然秩序而生产出符号权力。”(戴维·斯沃茨,2006:108)在本次研究所涉场合中,我们或许可以将符号建构理解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行为”。

被政坛放逐的士人在隐逸圈找到重新塑造自我形象的方法,隐逸符号与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相生关系,前者是一种看似无功利的利益追逐行为,它仍然发挥着维护现存秩序的功用。此原则最突出的体现,莫过于政治场域与文学场域的分野、仕与隐的抉择、雅与俗的区隔,深刻地烙印在士人的思维深处——尽管这种二元符号区分,在曲学场域中是以倒置的方式呈现的。例如,原著注释暗示出,康海等人自我辩护的用语仍源自朱熹的“性情”(页54n77、78)。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抱大才者,暗老豪杰”频繁出现于他们的评价中,不仅康海曾发出“尚当嗣为雅颂,以敷陈洪化,上媲商周之所载”的浩叹(康海,贾三强、余春柯,2015:509),这样的声音在山东曲家圈亦反复示及(李开先,嘉靖本:卷首;李开先,清钞本《卧病江皋》:卷首;李开先,卜键,2014:597)。

曲学场域的成员其实并未逍遥于主流文化所塑造的思维框架之外,他们需要消耗精力为自

己的荒唐举动赋予主流文化的意义，这种思维方式也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产物。陈著由于论述重心原因，有意悬置了政治场域的参照系。例如，他在回顾学术史将《沽酒游春》《中山狼》《王兰卿真烈传》《宝剑记》解读为政治剧之后，把讨论重心转移到曲作的文学展演性，认为这是曲家圈子创造的专属隐逸文学的世界（页 78）。或许此种纯文学视角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布尔迪厄理论，后者主要关注场域对隐逸符号资本的建构与权力竞逐。

遵循场域理论的逻辑，符号资本对于政治权力资本的依赖关系，可以回应上一章末尾提出的“逍遥与散诞”场域是否自治的问题。曲学场域与权力场域的互动，实是一个被建构亦内化建构、再生产建构的双向过程。“边缘”不仅意味着在政治权力场域中遭受排斥，还意谓在文学场域如何把“边缘”转化为自我区判的能力。在此需要追问的不是主体是否“自愿”，而是是否“自觉”，后者指他们有意识地把握了在场域中的位置。曲家圈子的士人承受了“暗老豪杰”的身份禁锢，但又不愿真的自绝于文人士大夫圈子以外，于是选择以逍遥散诞的边缘立场，一面度曲征歌、文人雅会，一面自嘲自辩、以俗为雅，保持与主流文化的暧昧关系。这种对逍遥与雅正两面的依违态度，解释了他们对主流士大夫文化的依附性及被建构特征。

（二）曲家场域内部分层与跨圈层研究

布尔迪厄理论的重要特征还表现在，他用“群体”代替“主体”，用“差异”“强弱”“占位”等代替“优劣”。他认为即使是“二流作家”也构成了“经典作家”所在场域的意义内容（布尔迪厄，石武耕、李沅洳、陈羚芝，2017：126）。在场域中没有至高和最终的仲裁，每种角色都是通过对其他角色的区别来认知和建构自我。场域研究者将自身从主流身份、中心地域、经典文类中抽身而退可能是不够的，这一研究或许还要求为场域内部的各个角色赋予同等的关注度和曝光度，因为正是他们共同构成（而非仅是松散附和）了场域的话语范畴。

陈著描绘了众多的曲家圈子场域与次场域，如果后继研究者将视野拓展至场域的各层级成员，重新审视不同场域间的权力关系，或许能揭示权力运作更深层的逻辑。除上一章提及的陕西曲家圈子的不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分层外，还有更多圈层值得加以结构化的分析。例如，陕西曲家圈子之外文士的祝寿曲与圈内人士的关系；陕西、山东后学与文学主潮的关系；李开先百阙曲《傍妆台》在本地、陕西圈子、全国范围这三个层级中的唱和话语对比；等等。这些不同的圈层或许将以陈著定义的“涟漪式波及”（ripple）的方式，共同参与建构曲家场域，并深化中心场域的意义。

在此过程中，中心场域并非凝定的意义来源，各个环节、角色为之产生意义赋能，形成相互波荡的效果。在李开先《傍妆台》全国唱和一例中，陈著示及：“散曲的社交性书写不仅直接取决于李开先的百阙曲本身，也有赖于接踵而至的次韵之作。”（页 246）李开先固然有作为样板的源发性地位，但文本传播中的读者同样扩充了文本衍生力和影响力。此场域乃是去中心的，这避免了本质主义的绝对建构，而为中心场域研究与“跨境研究”提供了深层启示。

(三) 曲学场域的共时与历时建构

据布尔迪厄场域动力学的思路,曲家圈子的生成不应该仅被理解成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一系列文学事件,而更应该是一种占位行动,与共时和历时的文学场域产生动力关系、社会权力关系,曲学场域中的文化资源、象征符号资源,才会真正转化为资本(戴维·斯沃茨,2006:86)。

历时坐标预示了场域的可能性走向,后继作者总是与前辈大家构成再选择、再阐释的关系,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曾指出,文学作者“建构了一些谱系,是为了给现在的这些用词赋予象征力量,因此,这些谱系是政治性大于学术性的。”(布尔迪厄,2017:314)陈著回顾了明初朱有墩的“忠诚剧”、乐论家的修身治国观、曲作中的田园隐居传统,又提及了陕西、山东二地后学的谱系追认,但这些论据与曲家圈子的关联并没有被描述成自觉性的谱系建构,曲学世代的更迭更有赖于人寿长短,而非文学潮流相互推衍,这为后续研究留下深耕空间。例如,关于陕西和山东曲家圈子的演替,陈著已经注意到了二者间的相互唱和、作序(页237、244、266),但尚未分析出前者对后者的态度,而这恰恰是两个场域更迭的重要的线索。正如《〈南曲次韵〉序》(页244—245)所揭示的,两个场域文化权力过渡的最主要原因是山东曲家圈子文化资本的崛起。如,王九思在该序中谦称“君以强仕之龄、绝人之资、博洽之学,加以感慨激烈之气,推山倒海,傲睨一世,凌驾千古,予老而衰矣,如之何其可及也”;又如李开先在序文中,引用康海作南曲的先例为乔岱辩护,试图为北人作南曲赋予合法性(李开先,卜键,2014:527)等等,都体现出两个场域更深层的文学承接关系。

共时方面,布尔迪厄认为场域的定义需要从与他者的差异中去估量,场域之间通过相互区分、彼此塑造的方式共存(布尔迪厄,2017:360)。陈著即初步勾勒了明代曲社相较于同时期诗文社的不同文化功能。遵循该书思路,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学界方家后续作出更具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譬如,李开先早年与“嘉靖八才子”仅论诗文,到以曲拜访康海、王九思,再到成为曲坛盟主后仍把词曲视作“诗文之余”(页313),将这些现象连贯起来看,是考察文类选择的重要线索。由于汉学界对明中叶曲学研究尚处发轫期,这种对曲学思想的梳理亦能对明代其他文类研究带来新鲜血液;同时,分析圈中成员诗学、诗作与曲学、曲作的不同实践,亦有益于重估不同成员的文化影响力。

结语

陈黼沅著《逍遥与散诞——十六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场域》的突出贡献在于首次系统地还原明中期陕西、山东曲家圈子成员的整体场域,将研究视域扩展到群体性的文本世界,代表了域外汉学界在建构在场语境和钩沉原始文献方面的成果。作为以布尔迪厄理论研究明中叶曲学的首部汉学著作,陈著更有文献奠基和方法论启示意义,对本土的文学群体研究法而言,具有“他山之石”的参考借鉴效用。

据布尔迪厄的理论,研究应当全景式、结构化地追问事件形成的原因和方式。研究者可以借助权力场域与文学场域的对比分析,尝试为后者划定合理的边界,提供同质共构的参考意义。在此基础上,有望通过身份、地域、旨趣等方面分析文学场域内部不同资本的总量和占比,揭示“边缘”者文化贡献的场域价值、阶层差异,以及场域自治性的双向建构特征。同时,场域位置是不断斗争和再生产的过程,需要引入共时和历时的参照系,分析场域的内在生成动力,这些恰是陈著关注的“跨文类研究”和“跨境研究”。我们可以期待,原作者以及各位方家能进一步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与曲学场域建构深度融合,为汉学研究和明曲研究界带来更多惊喜。

参考文献

- Bourdieu, P. (1992 et 1998). *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Éditions du Seuil.
- Swartz, 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161655.001.0001>
- Sieber, P. (2012). Book Review: *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2(1), 178–186. <https://doi.org/10.1353/jas.2012.0001>
- Tan, T. Y. (2010). *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ttps://doi.org/10.1163/9781684170593>
- 陈麟沅. (2006). 明中叶曲家康海资料的新发现及其价值. 载董建、荣广润(主编), *中国戏剧: 从传统到现代*(页 179–196). 中华书局.
- 陈麟沅. (2009). 康海后期南曲小令创作初探——兼论【浪淘沙】曲牌的几个问题. 载陈庆元(编), *明代文学论集*(页 1065–1076). 海峡文艺出版社.
- 陈麟沅编校, 孙崇涛审定. (2011). *康海散曲集校笺*. 浙江古籍出版社.
- 高应玘. *箬峰诗草·醉乡小稿*. 国家图书馆藏嘉靖本.
- 金宁芬. (2004). *康海研究*. 崇文书局.
- 康海. (2015). *康对山先生集*(贾三强, 余春柯点校). 三秦出版社.
- 李开先. (明). *新编林冲宝剑记*. 国家图书馆藏嘉靖本.
- 李开先. (明). *卧病江皋*. 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
- 李开先. (明). *中麓小令*. 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
- 李开先. (2014). *李开先全集*(修订本)(卜键笺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李颖瑜. (2023). 戏曲社会学的型构与实践——评陈麟沅《逍遥与散诞: 十六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场域》. *文艺研究*, (12), 148–160.
- 王九思. (1997). *渼陂集*. 齐鲁书社.
- 谢伯阳编. (2016). *全明散曲*. 齐鲁书社.
- 薛泉. (2025). *明代郎署官与文学权力*. 中华书局.
- 赵义山. (2007). *明清散曲史*.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星雨)